

三湘四水间的长征回响

湖南是红军长征历程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省份,从伟人故里的长征回响,到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;从“半条被子”的鱼水深情,到最后出发地的壮烈远征,这片红色沃土有着开展长征精神宣讲最厚重的底色、最鲜活的教材。

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,9月7日至12日,由湖南省委宣传部、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、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、湖南省教育厅、共青团湖南省委联合主办的“红军长征与湖南”红色故事宣讲活动走进韶山、汝城、通道、龙山、桑植等地,把长征故事讲到革命老区、讲到基层一线、讲到群众身边,为广大干部群众送上一堂生动而深刻的红色大思政课。

以下为从本次宣讲活动中精选的长征路上的真实故事,带领读者重温那段峥嵘岁月。

舍家为国 八口同征

湖南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杜双许 丹
张家界市融媒体中心 高钱华

罗尔伍(汉名:侯德明)是一位被阿坝藏族同胞收养的红军后代。2004年冬天,4张烈士证书揭开了跨越半个多世纪、罗尔伍一家八口结伴长征的革命往事。

故事始于1934年秋,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,任弼时、贺龙等率领红二、红六军团挥师湘西,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。罗尔伍的父亲侯清芝和叔公侯贵臣、叔叔侯清平加入红军,随后爷爷侯德成、奶奶殷成福、母亲刘大梅、姑姑侯么妹、小叔侯宗元也随家属连行动。

1935年11月,红二、红六军团奉命北上。出发前夕,组织多次劝说侯家家属回家,可全家人铁了心要跟着红军一起走。这份滚烫的赤诚深深打动了贺龙,他应允侯清芝全家随军前行,还特批了一匹马用来驮7岁的侯宗元。

长征路上,侯德成叮嘱全家:“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,万一哪个人掉了,只要剩下最后一口气,都要找到红军队伍!”

1936年5月,时任担架连连长的侯贵臣劳累过度,长眠于皑皑白雪;同年8月,14岁的侯么妹在一次抢救伤员时不幸中弹,生命永远定格在草原上;9月,侯德成在甘肃遭敌人阻击身负重伤,英勇牺牲,组织只好将7岁的侯宗元寄养在当地的一户农民家里;身怀六甲的刘大梅在红原被敌人冲散,善良的藏族乡亲收留了她。待生下罗尔伍后,刘大梅便独自踏上寻找红军的路程,却不幸迷失在茫茫草原;殷成福也因受伤掉队,孤身一人沿途乞讨,历尽艰难才找到队伍。一家八口踏上长征,最终只有侯清芝、

侯清平、殷成福在枪林弹雨中活着到达陕北。从此,侯家血肉至亲天各一方。

侯清芝后来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湘西剿匪,身经百战,多次负伤。回乡后,他从未放弃寻找失散的亲人。终于在1957年找回了寄养在甘肃成县的侯宗元。可直到侯清芝离世,他始终没能打探到罗尔伍和刘大梅的下落,母子二人成了侯清芝心里永远无法释怀的遗憾。

2005年4月23日,罗尔伍终于回到父母曾经战斗过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。70年前,父亲一家八口从这里启程长征;70年后,罗尔伍和小叔侯宗元重返故地团圆。罗尔伍蹒跚着来到父亲坟前,久久凝视,长跪不起。他对着墓碑轻声诉说:“父亲,我回来了!您的儿子侯德明回来了!”

这4张烈士证书镌刻着侯家一家八口同长征的铁血荣光,更是千千万万红军家庭无畏前行、舍生忘死的真实缩影。

永不消逝的面孔

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 李霞 张扬善

1925年,20岁的陈树湘光荣入党。2年后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,奔赴井冈山。1933年7月,在宁化与清流交界处的泉上之战中,已经是红军团长的陈树湘率一个团的兵力,歼灭、击溃敌人两个团,一战成名。第二年3月,29岁的陈树湘被任命为第三十四师师长。

长征开始后,红五军团担任后卫,红三十四师则担负全军总后卫。大军转移,后卫师既要牵制敌人,又要阻击追兵。三十四师成了长征大军中处境极其危险的一支部队,后人称为“绝命后卫师”。

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构筑的湘江防线时,掩护大部队转移的三十四师阵地上,战斗十分惨烈。陈树湘指挥官兵沉着应战,为大部队渡江争取时间。苦战五天五夜后,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涉险过江。待到三十四师完成阻击任务,与主力会合的通道已被敌人完全隔绝。脱离大部队的三十四师陷入敌人重重包围。几番苦战之后,5000多人的部队仅剩不到300人。

陈树湘决定绝地突围,他让团长韩伟率200人的主力突围,自己带领行动不便的伤病员阻击敌人。分手时刻,两位老战友留下生死约定:万一突围失败,就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。

1934年12月16日,湖南道县木田村。陈树湘用皮带勒紧腹部伤口,躺在担架上听汇报:“全师剩余53人,子弹103发,手榴弹21颗……”他慢慢扫视自己的残部,下了最后一道命令:“冲出去就是胜利!从现在起,三十四师只有同志,没有师长!”两天后,颠簸的担架晃醒了昏迷中的陈树湘——他突然发现,抬担架的已是敌人……“誓死也不能当俘虏!”他强忍剧痛,用手从伤口伸入腹部……兑现了“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”的誓言。

残忍的敌人把陈树湘头颅割下来,先是挂在道县城门上炫耀,后又送到长沙,悬挂在小吴门的城墙上示众。陈树湘牺牲时,离30岁生日不到半个月。

另一边,韩伟突出重围,危急关头,跳崖求生,落在一根树杈上,被敌人抓去关进了监狱,抗战爆发后获释。

1986年,韩伟含泪写下了《红三十四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记》一文,那是陈树湘和战友们壮烈一幕的真实记录。

陈树湘和战友们生前都没有留下照片。然而,历史记住了他们——记住了每一位把生命留在湘江岸边的红军将士的样子,记住了每一位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年轻面孔,记住了他们倒下时的姿势——面朝北方,朝着主力红军远去的方向。

一份“万万火急”电令

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 郑湘 郑治琦

在通道转兵纪念馆内收藏着一份珍贵的电令复制件。这份电令全文500余字,左上角标有:1934年12月12日和“万万火急”四个字。落款为:军委,十二日十九时半。它就是长征初期唯一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“万万火急”转兵电令。

1934年10月,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,由于“左”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,中央红军节节失利,被迫撤离苏区,开始战略突围。一路上,红军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,损失惨重。

12月12日,中央红军途经湖南通道县时,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,讨论迫在眉睫的前进方向问题。参加会议的有博古、周恩来、张闻天、毛泽东、朱德、王稼祥、李德。会上,博古、李德坚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,与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。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,毛泽东从党和红军的根本利益出发,力排众议,与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斗争。他说:“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,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。为什么要去钻口袋?大路朝天,各走一边嘛!”最终力挽狂澜促成了通道转兵。

会议一结束,当日19时半,立即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向各军团各纵队发出了西进贵州的“万万火急”电令。

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五个等级,分别是:平、急、火急、十万火急、万万火急,落款通常为“朱”“周”,或者“朱周”。但这份万万火急电令尤为特别,这是长征初期一封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,而且是唯一一封标注“万万火急”的军事电令。这说明该电令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紧急军事决定,容不得半点等待和停留,必须立即执行。同时也说明了西进贵州是没有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,由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决策的结果。

“万万火急”电令发出的第二天清晨,3万多中央红军分两路紧急向贵州前进,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甩在了湘西。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。

事实证明,通道转兵是中央红军在生死关头摆脱险境的正确抉择,为危急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开辟了前进方向,实现了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。

草地母亲

西南大学文学院 梁千仪
湖南雷锋纪念馆 付汝佳

1936年7月,川西北草地。风像刀子,雨雪没完没了

“村字号”的生命力,在泥土中

高婷



基层漫谈

近日,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松漠广场上,举办了跨省区“和美乡村”篮球赛。赛场上,8支乡村球队激烈角逐;赛场外,非遗集市、特色小吃夜市角闹非凡,人流涌动。

几乎同一时间,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的“和美乡村”篮球赛收官。这个赛季,共吸引全县195支队伍参赛,完成670场比赛,现场观赛超40万人次。人们凭观赛票根可在全县40余家餐饮、民宿、商超享受优惠,赛事累计带动县域消费超800万元。

两场“村BA”南北呼应,把乡村文体的热闹氛围拉满。自从贵州榕江“村超”火遍全国后,不少地方都在问:我们能不能也办出这样的全民参与的乡村盛事?

越来越多地方用行动给出了答案。据统计,从“村BA”到“村晚”,从“村T”到“村播”,如今全国“村字号”活动类型多达20余种。2025年,仅“村晚”一项,全国就开展了9.13万场,线上、线下参与达6.92亿人次。“村超”“村BA”“村T”三大IP全网传播量累计超过2800亿次。

亮眼数字的背后,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摆上了桌面:遍地开花的“村字号”,有多少是真正“长”出来的,又有多少是“搬”过来的?

榕江“村超”的成功,靠的不是模板。榕江人踢球是有传统的,几十年间,河边沙坝、山脚空坪,几块石头一摆就是球门。队伍怎么组建、赛程怎么安排,全由村民集体说了算,冠军牵走一头黄牛,亚军抱回两头香猪,

季军带走三只山羊……“村超”品牌运营收益的51%用于壮大全县250个村集体经济,49%用于球队建设和青少年训练。第四届“村超”已从第一届的20支本土球队发展为137支本土球队参赛,累计吸引全国1750支足球队和来自62个国家的1700余名国际球员来榕江交流,全县新增市场主体9000余家,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300亿元。

“村BA”起源地贵州台江县台盘村,同样有着数十年篮球赛传统。村里办赛,村里组队,村里定规则,从裁判哨声到计分板,都是村民自己的事。2026年,“村BA”迎来举办5周年,累计举办赛事超5000场,全网曝光量突破1350亿次。

这套“土生土长”的逻辑能复制吗?能。但很多地方只复制了“热闹”的表象,忽略了其背后的文化根基——几十年传统的积淀、村民自发组织的机制、全民参与的热情、乡土认同的情感……

“村字号”的生命力在“土”不在“洋”。贵州遵义市桐梓县去年上演326场“村晚”,催生9坝镇3.8亿元避暑旅居收入;贵州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办“村戏”,深挖124个民间故事、310首民歌,让土家族花灯戏焕发新机;浙江安吉开“村咖”,把竹林风光装进咖啡杯……这些成功案例都抓住了同一个道理: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。在同质化内容泛滥的当下,本“土”特色反而成了最稀缺的“潮”。

还有一个根本问题:部分活动里,农民成了被安排的配角。办乡村文化,是服务农民、提升农民,绝不是“消费”农民。“村字号”的底层逻辑,从来都是农民自己的事。

当“村字号”从个别爆款走向规模化,流量终会退潮,唯有扎根实际、尊重规律、凸显主体,才能避免昙花一现。

我的挂职故事

艺术赋能,让阿尔山的山水更有温度

杨琼



杨琼在文化和旅游部“老艺术家文化志愿服务工程”走进阿尔山的演出筹备现场。

一位老阿妈拉着我的手说:“这辈子头一回在家门口看这么高水平的演出。”艺术家们不光演出,还帮村里创作村歌、编排村舞,手把手教村民跳舞。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的团队来了,他们走进村民大食堂,与村干部一起改良“西口十八碗”,研发阿尔山特色小吃,让地道乡土味有了地道的“舌尖”表达。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系统梳理了6年来进村帮扶的成果,为后续工作打下基础。艺术季期间,13处大型艺术装置落地山野,与山水风貌融为一体;全域乡村墙绘完成了提质改造,原本灰扑扑的村巷,仿佛一夜之间“活”了过来。

文化活动热热闹闹地搞起来了,但我心里清楚:一时热闹撑不起长远发展。基层文旅工作,既要补齐基础设施等硬件短板,更要着力强化文化服务、人才队伍等软实力建设——根植地域文脉,彰显本土特色的文化作品,才能引发群众持久的共鸣。

西口村老村部此前已改建为看山艺术馆,2024年我到任后,和驻村书记谋划启动老村部厢房改建洮儿河文化馆的工作。从方案

设计到展陈布置,我们反复推敲,建筑师、村干部坐在一起合计了无数次。至2026年4月我挂职期满,洮儿河文化馆主体工程及内部展陈全部竣工,这是洮儿河全流域第一个主题文化馆。馆内展陈系统梳理了洮儿河千年历史文脉、林牧农三区交融共生的地域文明,以及西口村本土发展史。看山艺术馆与洮儿河文化馆并立呼应,我们给这个院落取名“西口山水空间”,从地理与人文的双重维度,铺陈村庄与大兴安岭、洮儿河、科尔沁草原之间深厚的地缘联结,打造山、水、村三位一体的特色文化阵地。

硬件也有了,文化产品怎么来?2025年,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带着帮扶情怀奔赴阿尔山,为当地量身创作歌舞剧《阿尔鹿之哈伦阿尔山》,把阿尔山的旅游IP和故事活化呈现,由阿尔山市乌兰牧骑排演。首演那天,剧场里坐满了干部群众,掌声一阵接一阵。这部作品成为国家艺术院团与地方本土文化成功结合的范例。挂职期间,我还多方协调,为当地争取乐器、图书、药品、书画等物资,推动建成数千平方米室外运动场地。但对比来看,文化服务、技能培训等软实力帮扶,成效更为突出,群众认可度更高。

帮扶不仅是“输血”,更要“造血”。我经过不断思考,指导西口村组建旅游运营主体,推动村落旅游市场化自主运营,让村民真正成为文旅产业发展的主角。从中央机关到边境小城,这两年的挂职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:文旅工作始终兼具事业与产业双重属性,只有统筹好公益导向与市场规律,文化和旅游的双向赋能才能行稳致远。

两年挂职,我目睹了艺术如何让乡村焕发新生,也见证了文化如何让旅游有了灵魂。临别时,那位曾抱怨“游客留不住”的村民笑着说:“现在村里有看头、有玩头,还有地道美食,游客也多了,我们干旅游有动力,越来越觉得有奔头。”那一刻,我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了。艺术赋能从来不是空话,而是让老百姓的日子有滋味、有盼头,让祖国的山水不仅有风景,更有温度。

(作者系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教育处二级调研员)